



中国医生称： 有责任但没 时间做研究

▲本报记者 文韬

如果把发表科学引文索引（SCI）论文和晋升这一话题抛到年轻医生群体，多会群情激昂。是啊，医生不好做，中国的医生尤其难做。临床研究到底是奢侈品，还是必需品？SCI 论文难道已变身为中国医生发展之路的“拦路虎”？

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项莉等在《柳叶刀》撰文称，作为医生，承担医学研究很必要，因为“从事医学研究，有助于发展分析问题的能力，培养严谨的思维”。尤其在中国，各种疾病的海量病例，无不值得弯下腰去潜心研究。而这种责任，这种贡献，对于全球都很有意义。（Lancet. 2014, 384: 956）

另外，他们认为，在中国，临床医生是否应该去从事医学研究，并不是争论的关键，而医生们也并非不晓得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。重要的是，他们的精力、环境是否允许去做研究。

在中国，小到一个感冒，患者也会去三甲医院挤来挤去，这也并非新鲜事物，医生也只能埋头处理云一般密集的患者。即使这种小恙本来完全可以由散布在患者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处理。如此这般，临床医生的时间和精力就被压缩得捉襟见肘，科学研究之类的自然也顾不过来，SCI 论文也逐渐变得面目可憎。

作者认为，想缓解临床医生和临床研究以及发表 SCI 论文的矛盾，主要涉及两个关键问题：一是如何科学、合理地分流患者，充分发挥不同级别医院的优势，缓解三甲医院的就医压力；二是去重新设计一种评估医生晋升的科学体系。

作者表示，在中国，科学研究论文是否必须发表在国家级期刊，或者干脆与晋升捆绑在一起，其合理性都值得探讨，并作深入研究。而当前，关注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为凤毛麟角。要知道，唯有健康的体系，才能襄助医生健康地成长。

JACC 介入子刊主编放言 中国研究正走出“山寨”

▲本报记者 文韬 董杰

《美国心脏病学院杂志》（JACC）介入子刊主编 Spencer B. King III 可谓中国人的老朋友了。他在 1987 年就来过中国，之后便一直穿梭在中美两地。

King 在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题为“中国研究：从模仿到创新”的编者寄语。他说：“在 2014 年，我更惊讶于中国速度。”（JACC Cardiovasc Interv. 2014;7: 1460）

中国开展临床研究有独特优势

King 说：“中国街头的中山装变化为巴黎时装，自行车和人力车变换为奔驰和玛莎拉蒂已没有什么稀罕了”。

而对于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来讲，医疗器械的升级让人目不暇接，在 1987 年中国还没几个导管室，器械显得陈旧老化，

但今天已经大变样，“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就已有 16 个导管室，2015 年将增至 25 个。”

而中国研究的满地开花，也更让人心动。King 所到之处，中国学者介绍的各种动物实验、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也让他赞叹不已。

中国已不复“吴下阿蒙”

中国医生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，“忘掉 Meta 分析吧，只做好自己的研究”，便是一位有见识的资深中国学者给 King 留下印象最深的话。

King 认为，数年前，中国的研究项目还相对不成熟，但随着逐年的沉淀和发展，中国已不复“吴下阿蒙”。不仅一些与主要国际组织（如牛津大学等）合作的大规模研究周密

展开，地方性有专长的研究也进行得如火如荼。

另外，King 也看到了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的独特优势。一是在中国患者从来都不少，而之前耳闻的患者如何不愿意参加临床试验云云，到如今似乎也已不复存在。此外，一些全国范围内的、较大规模的注册研究也发展较快。

King 认为，较多患者参与

King 认为，在临床研究领域，各种综述，不管是否为 Meta 分析，在未来都会让路给原创性研究。对于中国医生而言，他强调，发表高质量的论文，90% 以上取决于研究的质量，而不足 10% 的成分在于论文的写作。

的研究，也更能明确锁定较多临床问题。但临床研究也需要“砸钱”，而就世界范围内，这种支持也多来自企业赞助。他认为，注册研究的优势，在中国或许会随着政府对临床研究财政拨款增多而更加扩大化。

此外，对于初步发展注册研究的中国，他也认为，美国国家心血管病注册研究数据库的建立可为中国所参照。

Research in China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

Spencer B. King III, MD, MACC, Editor-in-Chief, JACC



从亦步亦趋 模仿到创新

King 非常看好中国的心血管病研究，他也希望中国在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，能够刺激其他具备较好研究能力的国家充分投资于生物医学研究。因为埃博拉疫情已凸显生物医学研究投入的不足。

让 King 感慨的是，在中国无论是临床研究还是医疗设备的发展，都已正“从亦步亦趋地模仿，逐渐转变为创新”。

就中国医学的最新进展，King 表示他将在世界级顶级杂志中等待中国更多、更高质量研究的来临。

中国已成为科研强国？

▲本报记者 文韬 董杰

近日，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《2014 年全球自然指数》显示，中国是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的领先国家，仅次于美国，位列世界第二。另显示，北京已成为全世界发表 SCI 论文数量最多的城市（Nature.2014 年 11 月 12 日在线版）。难道中国已然成为科研强国？与该结果给国人带来的喜悦相比，质疑之声似乎更响亮。

中国科研产出全球第二

由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，旨在衡量全球两万多科研机构在高质量论文方面的产出情况。2014 年发布的自然指数显示了全球多国加权分数计量，中国被报道为“高质量科研产出全球第二”（图 1）。然而，从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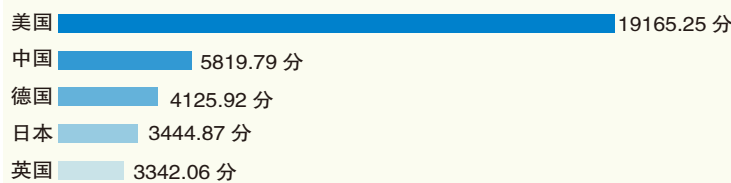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2014 年全球不同国家自然指数 TOP 5

字对比来看，中国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。

《2014 年自然指数中国增刊》数据显示，在中国城市中，北京的自然指数最高，达 1329 分，其论文篇数是上海的 2.4 倍，南京的 5 倍。其他科研产出位于前列的城市还包括南京、香港、长春、武汉、合肥、杭州、广州和天津。（Nature.2014 年 12 月 17 日在线版）

北京坐拥世界上最大的研究

机构——中国科学院，加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个中国顶尖学府的助力，使得北京成为自然指数最大的城市。其自然指数产出值甚至高于加拿大整个国家的数值。

中国科研投入产出的效率与发达国家有差距

据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，中国每年投入科研经费 1 万亿元，而用于科研项目本身的仅占 40%，其余 60% 竟然流失在项目

之外的不知晓的某处。

国内科研者意识到当前科研体制存在的弊病，感慨中国科研投入产出的效率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。因为毕竟论文是论文，研究是研究，真正让研究能发挥实际作用才是正道。如 2013 年 8 月，中国学者在《科学》发文指出，“在中国，研究与商业已脱节数十年，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了创新技术和产品。中国企业对国内不报什么希望，只好依赖于国外的核心技术。”

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；这是智慧的时代，这是愚蠢的时代……”，处在一个时代的中国科研，需要扬弃，需要变革。唯有如此，未来之路才能更为光明。